蒙元时代的公文书史料：原文书与集成文书之间

〔日〕船田善之（广岛大学文学研究科　日本广岛县）撰
申　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译

所谓“文书”，就是传递、核对信息的文字。其中，由官府及其成员在公共事务过程中发出、接受或保存的文书则称为公文书。“文书史料”作为历史研究重要的史料群之一，在笔者所从事的蒙元史研究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杉山正明曾将“文书学的胎动”称为蒙古时代史研究的新动向之一，预见了其后文书研究必将在蒙元史研究中崭露头角（杉山正明《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9 年，第 523—526 页）。

近年来，蒙元时代文书史料环境日益改善，相关研究也取得很大的进展（船田善之《元代汉文公文书（原文书）的现状及其研究文献》，《西夏学》4，2009 年；《蒙古帝国（大元）史研究中的汉语文书史料》，《历史与地理》649，2011 年）。其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黑水城出土文书影印出版，如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等。基于这些影印的原文书的成果也不断涌现，如杜立晖、陈瑞青、朱建路《黑水城元代汉文军政文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 年）等；第二，《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以下略称作《元典章》）的译注、点校、校订本出版，如《〈元典章·礼部〉校定与译注》（《东方学报》81—83，2007—2008 年），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全 4 册，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还有《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史语所，2016 年）；第三，在韩国发现《至正条格》残卷，并且出版了影印本和校注本（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全 2 册，Humanist，2007 年）；第四，刻有公文书的石刻史料，即石刻公文书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船田善之《从石刻史料开拓蒙古帝国史研究：以华北地域为中心》，早稻田大学蒙古研究所编《蒙古史研究：现状与展望》，明石书店，2011 年）。

随着文书研究环境的好转，不仅使蒙元史研究中利用文书这种文本成为可能，而

且也会给长期以来文书史料研究中缺乏原文书的这一状况带来重大变革，从而获得蒙元时代的文书及其制度的新鲜信息，为重新认识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创造了条件。当然，原文书以外的“文书史料”与原文书是一种相互补充关系，其在蒙元史研究上仍然不可或缺，甚至作用更为明显。

本文将概述蒙元时代公文书史料中的一个重要史料群——集成公文书。集成公文书就是《大元通制》、《至正条格》、《元典章》等典籍中汇集编纂收录的公文书的总称。本文在介绍近年来日本研究成果的同时，着重分析这些典籍中收录的文书与原文书之间的关系，并简单介绍一下利用此类史料的心得。

一、集成公文书的概况。元朝建立之初，曾循用金律，但从至元八年开始，禁行金律。此后汉人官僚屡次奏请制定新律，但终未有果（植松正《〈元典章〉文书的构成及其成立》，《中国史学》21，2011 年）。当时，在具体的行政和司法事务中，主要是参照皇帝（大汗）的圣旨及基于圣旨而形成的中央政府的格与例。对于中央、地方的官僚、胥吏们来说，从所属衙门的架阁库保存的公文书中寻找合适的先例便是他们的日常事务。当时这些公文书，按季分类、整理，每一案卷有标题，有序号，依年代顺序保存（中岛乐章《元代文书行政中八思巴字的使用规定》，《东方学报》84，2009 年）。可以想见，查阅这些文书，任务相当繁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为了减轻负担，十分有必要将合适的先例编选成集，这也就是《大元通制》、《至正条格》、《元典章》等集成公文书典籍形成的原因（植松正《〈元典章〉文书的构成及其成立》；岩井茂树《元代行政诉讼与裁判文书：以〈元典章〉附钞案牍“都省通例”为素材》，《东方学报》85，2010 年；船田善之《蒙古帝国（大元）史研究中的汉语文书史料》）。

二、集成公文书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早在蒙元时代原文书很稀见的时期，这些集成公文书就已经为蒙元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信息和新的视角。不过，从文书研究角度来看，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集成公文书只是庞大的公文书中很少的一部分，那些没有挑选作为先例的文书则被排除在外。在挑选公文书时，主要选择那些包括了皇帝或中央政府的最终处理意见的下行文书（植松正《〈元典章〉文书的构成及其成立》），一般的上行文书及路及肃政廉访司（提刑按察司）层级以下衙门发出的下行文书几乎不予采录（宫纪子《程复心〈四书章图〉出版始末考：大元兀鲁思治下江南文人的保举》，《内陆亚洲语言研究》16，2001 年）。

第二，集成公文书所收录的是一件一件的公文书，虽是以原始公文书为底本，但经过了编辑（船田善之《蒙古帝国（大元）史研究中的汉语文书史料》），正因如此，田中谦二、植松正将《元典章》收录文书称作“元典章文书”，以便与其他文书相区别（田中谦二《元典章文书的构成》，《东洋史研究》23－4，1965 年；植松正《元

典章文书分析法》，《十三、十四世纪东亚史料通信》2，2004 年）。因此，集成公文书是与原文书性质不同的编纂史料，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三、集成公文书与原文书的关系。严格来说，集成公文书所收的公文书并不是第一手史料，但考虑到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原文书文本，因此，它们也具有无限接近第一手史料的一面。

集成公文书，多数都是最终定案的下行文书。这样的公文书，引用了从案件发生到最终定案过程中，地方、中央衙门及大汗之间往来的公文。因此，在最后发出的下行文书中，这些公文被引用，从而嵌套其中。萩原守将具有此种结构的公文书称作“多重直接引用”形式，萩原认为这种“多重引用方式”是中国传统汉语公文书的风格，清代蒙古的审判文书也采取了这一形式（萩原守《清代蒙古的裁判与裁判文书》，创文社，2006 年，第 152—162 页）。本文也沿用这一称呼。

这一公文书结构，源于中国高度复杂化的政府组织及其文书体系，也与彻底的惯例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某一衙门或官员收到某一公文书，就要根据其报告、指示、询问的内容，行移给其他衙门，这时，就会引用前一衙门的公文。当然，这种引用多是节略引用，概要说明报告、指示、询问的背景与关系。岩井茂树曾分析过一件“申文”，原始文书超过了 3000 字，引用时被压缩为 134 个字（岩井茂树《元代行政诉讼与裁判文书》，《东方学报》85，2010 年）。在特殊情况下，为保证原文书内容的准确与严密，有时也会附上原文书或其抄件。这种先前公文的引用有明确的规范，原文书末尾部分的日期会移到最前面，同时写明发文、受文机构或官员，并注明文书的属性，然后再引用其文本。

《元典章》收录的公文书，就是基于这一引用方式。其节略、编辑的方式，与那些原文书引用公文的方式没有大的差别，这也是集成公文书与原始公文书无限接近的一个理由。例如，《元典章》收录的江西行省札付中引用的“中书省咨”，和黑水城出土的甘肃行省札付（原文书）中引用的“中书省咨”，都是被行省官吏出于引用目的而加以编辑的集成公文书，两者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关于这一情况，岩井茂树通过公文书（札付）抄本的分析，明确地说明了公文书的节该（节略）并不是《元典章》编纂过程或官府的先例积累过程中完成的，而是札付、咨等原始公文书本来的形态（岩井茂树《元代行政诉讼与裁判文书》）。

《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收录的条文也同样如此。不过，与《元典章》相比，那种多重引用方式的嵌套结构没有那么复杂，这是因为其条文就是从皇帝的圣旨或中书省、御史台等发出的下行文书中抽取的核心部分。岩井茂树认为蒙元时代的“断例”、“条格”在积累、编纂过程中曾按照一定形式整理过（岩井茂树《元代行政诉讼与裁判文书》）。同样，中书省、御史台发出的下行文书，在引用过去中书省、御史台的公文书时，也常常如《大元通制》、《至正条格》那样，所引条文尽可能简

洁，只保留必要的内容。公文书在引用这些条文时，也要重新处理一下。

综上可知，集成公文书可以说是基于规范化引用方式而整理的公文书合集。而在不同史料的多重引用方式中，原文书残存程度的差异，是由于编纂主体、原文书的发出者及类型的不同而造成的，同时与保存机构、编纂目的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大元通制》、《至正条格》将中央政府的最终意见加以精简总结，因而具有了某种法典的性质。“尽管其不具有唐代律令那样的内容，但以律学为基础模仿律令的意图很强烈”（植松正《〈元典章〉文书的构成及其成立》）。而《元典章》则采取了六部分类结构，其所引用的文书保留了皇帝或中央政府最终裁断之前的文书行移情况，清楚地显示出地方官府处理、行移文书的细节，其所提供的先例不仅仅是官员判断的依据，同时也兼具文书处理手册的意味。当然，无论是《元典章》，还是《大元通制》等，它们在提供给读者可以方便参考的先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结语。无论是公文书原件、抄件，还是集成公文书，由于多重的引用方式，从而形成了复杂的嵌套结构。若想准确地理解文本的内容，就必须正确把握这一结构。对于这种文书结构，早期有田中谦二开拓性的研究，明确了基本的解析准则。后来植松正对如何分析嵌套程序做出很大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利用这些集成文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船田善之《关于解读〈元典章〉：兼谈有关工具书、研究文献》，《蒙古学信息》2000 年第 3、4 期；植松下《元典章文书分析法》）。

近年来，岩井茂树的一系列有关蒙元公文书的结构、样式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岩井茂树分析了一份超过 3000 字、首尾一贯的集成札付文书的复杂结构（岩井茂树《元代行政诉讼与裁判文书》）。通过他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黑水城文书，可以使我们把握除圣旨等所谓王言以外的官文书的全貌。换言之，对比原文书与集成公文书，我们能够推断出文书被引用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虽然公文书引用时的节略无法逆转，也无法重构原文书，但是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原文书的面貌，进而分析集成公文书的特点。今后，我们在利用集成公文书时，必须时刻具有这种意识。

本文系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科研费 26284097、26370826 的成果

（责任编辑：李成燕）